

当代视野下的蔡邕研究及意义

陈海燕

(西南石油大学 学报中心, 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 从现代学术研究的视野入手,对文学史上蔡邕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发现历代对蔡邕的评价有两个突出的对立面,或极尽褒赞,或大力贬斥;分析这一严重对立现象产生的原因,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史研究上存在的严重弊端:大量札记式的评论由于缺乏细致的文本阅读及史料分析而存在着轻下断言的问题,以所谓的人品、道德决定学术成就的庸俗史观,对名家的过分迷信、崇拜导致的以讹传讹等等。从这些问题出发,提出在新的学术视野下重新进行蔡邕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东汉; 蔡邕; 当代学术视野; 钱钟书; 鲁迅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1-0089-06

一 蔡邕在中国文史上的地位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他生于东汉顺帝阳嘉二年(133),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因董卓被诛受牵连,下狱而死,享年六十岁^[1]¹⁹⁵。他的一生,大约与汉末顺、桓、灵三朝相始末,正值东汉王朝从衰败走向覆灭的时期,“祸始于桓、灵,毒溃于献帝,日甚日滋”、“大权移于女谒、宦竖、佞人……此今古败亡之所以不救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八“顺帝”)闇主权阉、国无宁日,蔡邕正生活在这样一个衰弊不救的时代,他一生的经历,都被打上了时代特有的烙印,从青少年时期的隐而不仕,出仕后与党人的亲密交往,到中年时亡命江海,晚年被强力征辟以及最终下狱而死,都与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间的剧烈斗争、两次党锢等历史背景和重大政治事件密切相关。

作为汉代乃至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才式人物,蔡邕“少博学,……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后汉书·蔡邕传》)。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举凡碑诔、辞章、史志等,靡不精通;他工书擅画、精于音律,兼及天文律历、阴阳讖纬术数等,亦无不博洽。在文学上,他的碑诔、辞赋等,对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及以后的作家都有直接影响;在史学上,他立志撰集汉事,不仅参与了《东观汉记》的编撰,还亲自撰写了《十志》、《独断》、《月令章句》等著述,给后来修《后汉书》诸家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他还擅

长书法、绘画、音乐等,在各个领域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成就,代表着东汉时期的最高水平,不仅绝冠当时,且流风所及,影响深远^[1]。在《后汉书》中,蔡邕的传记占据了最长的篇幅,足以见证范曄及南朝时人们对他的重视程度。

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蔡邕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很多学者都有提及。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曾指出:“蔡邕是艰难地忍受了东汉末期漫长而险恶的时代动乱,并终生支撑着两汉以来宫廷贵族文学的当时第一文豪。……在以后展开的六朝文学流向方面,蔡邕在文学史上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也许比预想的还要大。”^[2]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认为:“东汉著名的作者,大家都推班(固)、张(衡)、崔(瑗)、蔡(邕)、蔡氏时代最后,地位也最重要。由此过渡,便到了所谓建安七子。”^[3]事实上,蔡邕在东汉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仅得益于个人才华,更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

东汉末年,是一个文学思想与社会风尚都孕育着新变的时期,魏晋时代的各种思潮,往往都于这一时期初露端倪。顾炎武曾提出:“以二汉言之,东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日知录》卷十九“文不贵多”)顾氏所论的“文衰”涵盖了经学的概念在内,汉末确实是一个经学衰落的时代,然而,它又是一个文学新变的重要时期。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和鲁迅先

生都曾提出过相似的观点,认为“曹丕的一个朝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目前这一观点基本得到了大多学者的认可。追溯起来,这一“文学自觉”的来临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发肇于东汉后期,成长于东汉末年,成熟于建安时期,作为汉末文学活动的代表性人物,蔡邕为这种重大转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这一嬗变时期的鲜明特征,即新旧承接所特有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不甘儒学衰微,倡议“正定《五经》文字”,并亲笔书丹于“熹平石经”,为当世学子制定规范;他露布上书,斥责鸿都门学为“俳优”群小,称书画辞赋“聊以游意,当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陈政要七事疏》),这一系列行为,都足以证明他视自己为儒家思想和道德行为规范的捍卫者。同时,他将撰集汉事作为自己终生的使命,无论是被逐边野,称“肝脑流离,白骨剖破”亦“无所复恨”(《戍边上章》),或是“于忧怖之中,昼夜密勿,昧死成之”写完《月令章句》(《月令问答》),还是下狱临死之前“乞黥首刖足,续成汉史”,都明确地体现出儒家“立言不朽”的思想对他的深远影响。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在蔡邕的文学作品中,明显地表现出社会思潮和文学风尚的嬗变:他的辞赋,不仅沿袭并发扬着贾谊以来抒情小赋的范式,且大胆地拓展着新的题材和表现领域,他任情恣性,以率性的笔触袒露内心深处的相思爱欲等世俗化情感,无论是丽辞艳语的描述还是遐思绮念的表达,他的辞赋不仅在当时受到了张超等人的讥诮,也引起了后人的议论纷纭;他的诗歌,虽然传世作品不多,大部分还沿袭着四言韵语的形式,其中《饮马长城窟行》的归属尚还有争议,但他的《翠鸟诗》至少可以被视为最早的五言咏物诗,给后世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针对蔡邕文学风格的多面性和矛盾性,后人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各种评价:他为文长于碑诔铭箴,现存《蔡中郎集》中大部分作品都是这一类著作,刘勰认为“才锋所断,莫高蔡邕”(《文心雕龙·诔碑》),推崇他为碑诔文的最高典范,将他的风格归结为“精雅”(《文心雕龙·才略》)。同时,在汉赋发展史上,蔡邕也是一个无法忽略的话题,对于他的《协初婚赋》^[4]、《青衣赋》、《检逸赋》等抒情小赋,各种评论贬褒不一,他既被誉为“两汉赋家的殿军”^[5],也被视为“不仅是转变汉赋思想内容的第一人,他同时也是转变汉赋艺术形式的第一人。”^[6]然而,针对《协初婚赋》一文的内容,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批评道:“然则谓蔡氏为淫媾文字始作俑者,不可

也。”^[7]对以上两种看似矛盾的评价仔细考察可发现,这种现象一方面体现了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也代表着嬗变时期文学风尚的矛盾性在作品中的流露。

对于蔡邕其人其文,范晔《后汉书·蔡邕传》的评价“邕实慕静,心精辞绮”,诚为不易之论。“精”,可以视为蔡邕在文章中所体现出来的“精雅”和“典正”;“绮”,不仅代表蔡邕文章的精工富丽、文采斐然,更重要的是,他的辞赋中确实还多有绮丽艳情之辞,故有“辞绮”之说。作为汉魏文学风尚嬗变过程中的重要人物,蔡邕一方面继承了东汉以来受儒家思想支配的庄重典雅的美学风尚,致力于碑诔铭箴这类颂终礼文的制作,并对其语体规范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范晔“精雅”二字的评价主要是针对他这类文章。然而,“文变染乎世情”,文学风尚的嬗变在蔡邕身上也体现得十分明显,他大胆甚而略嫌放浪的笔触,已经启开了“文学的自觉时期”之门,并给建安士人以重大的影响。针对这些,刘跃进先生指出:“在汉魏文学风尚转变过程中,蔡邕是一位比较重要的人物。”^[8]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建安文人踊跃抒写真实性灵的风尚可谓渊源有自,《古诗十九首》的产生年代现在还有一些争议,但大多学者认为这些作品产生于东汉中期,也就是蔡邕所生活的时代。不管是无名氏还是署名的文人作品,都可以看出当时文学风尚的转变:由典正精雅逐步发展到恣性任情。这一点,在张衡身上初露端倪,到了蔡邕,才基本完成这种转变。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性人物,蔡邕不仅以其“精雅”的文笔给两汉厚重典正的文风作了圆满的总结,更重要的是,一扇新时期的文学之门,正由这位旧时代的集大成者来缓缓开启,他率性而诚挚的文字,不仅对建安文人起到了筌路蓝缕的作用,并且,他长于细节刻画、工笔描述等特征,在后来的六朝文学中也得到了遥远的回应。

二 当代研究对蔡邕重视不足的原因分析

刘跃进在《蔡邕的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转变》一文中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重要作家在当时执文坛牛耳,而在后世却逐渐为世人所忽略,甚至淡忘。”^[9]而蔡邕的现象,即是其中一个典型的范例。

在东汉末年及随后的六朝时期,皆可看出蔡邕的影响力及后人对他的重视程度。南朝时期的《文选》和《文心雕龙》两部力著,就分别以选和论的方式,对他的碑诔辞章等做出了较高的评价;蔡邕的传

记,不仅占据了范曄《后汉书》人物传记的最长篇幅,而且,唐代李贤作注的时候,还对《蔡邕传》产生过怀疑,认为蔡邕叹卓一事乃是范曄误记,力证以蔡邕的人品断不会为董卓之死而叹惋;唐代的诗赋中也常常用到有关蔡邕的典故,基本都是从褒赞的角度来看待他的不幸遭遇,惊叹他过人的学识和成就,盛赞他的书法、音乐、绘画才能,颂扬他对边让、王粲等人的提携,很少有人对他的人品和行为产生质疑。

但是,到了宋代,对蔡邕及其女蔡琰人格的攻讦开始逐渐增多,宋人从儒家思想的道德评判标准出发,因德论文,对蔡邕做出种种严厉的批驳,连带他那屡遭人生不幸的女儿蔡琰;这种抨击至明末清初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其中以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最为严厉,同对扬雄仕为新莽之臣的批判一样,他们对蔡邕从卓一事发出了严厉抨击,连带否认他的文章学识;渐至近代,李兆洛、刘师培等人对蔡邕的文章复又极为赞赏,李兆洛撰《骈体文钞》首推庾信,次即蔡邕,刘师培对蔡中郎推崇备至,视其文为古文之圭臬。

综观历代对蔡邕的评论,往往会发现两种极端不同的论调,既有学者极力称颂蔡邕的文章学识,也不乏论家力贬蔡邕的人品、德行,如钱基博、钱钟书父子二人,钱基博对蔡邕文章极为赞赏,于《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屡屡赞叹,而钱钟书则从人品学品等角度批评蔡邕“才卑识荒”,将其推为“淫媠文字始作俑者”,极为贬薄,这两人的观点可谓极具代表性。

事实上,近两千年以来,针对蔡邕其人其文,固然论者纷纭,各抒己见。然而,在当代的学术视野中,蔡邕及其文学作品的地位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多数文论家在论述汉代文学史的时候,对蔡文的成就及贡献,多是一笔带过,甚而只字不提,这不能不被视为中古文学史研究的一大缺憾。笔者认为,当今蔡邕研究的寥落,其中有几条比较重要的原因:

第一,研究热点的波及。自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史序》中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著名论断,并将汉赋视为汉代文学的代表式样之后,这种论断对学术研究本身产生了导向性作用,曾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大多对汉代文学的研究都集中在汉赋上,汉赋尤其是大赋一度成为近些年学术研究的热点。由于蔡邕集中没有大赋作品流传下来,各种传记史料也没有提及他有这类作品,故研究汉代文学史的学者提及蔡邕时,只是略论他的几篇抒情小赋。这种热点极热,其余各处又极为冷清的现象,在当今的文学研究领域屡见不鲜,蔡邕仅是其中的一个

范例。

第二,文学观念的演变。今天所谈到的文学研究,大多集中在诗词歌赋这类纯文学作品的范畴内。然而,在东汉时代,“文学的自觉”还没有实现,能保存下来的蔡邕作品大多集中于碑谏铭箴、律历史志等方面,这些当时并没有被排除在文学范畴以外的文体,已经被当代研究者排除在文学研究的领域之外了。故大多数文学史论著提到蔡邕时,无法论及他抒情小赋之外的其他成就,而这几篇赋本身数目就不多,加上又多是残篇,难以成为关注的重点。

第三,当代对蔡邕研究的冷落,还与意识形态影响有关。长期以来,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习惯于以道德评判来决定文学成就,讲求所谓的“道德文章”,以“人品定文品”,以道德评判来代替文学批评,以作者个人的德行来评价其文学作品的成就及地位,对历史上评价不高或名声有污者,对其作品往往也持负面评价的态度,这种以简单的庸俗史观来代替对文学作品本身的阅读和研究,往往会干扰对学者对文学史做出客观理性的研究分析。

而蔡邕这一形象,随着历史的变迁,一个正史里忠孝素著、博学笃行的孝子形象被后人加以演绎,成了宋元词话中的“满街争说蔡中郎”。至于蔡邕是怎样演变成一个“不忠不孝”的历史符号,研究者各有所见,并无确论。然而,从中却不难窥知后世对蔡邕负面评价的几个重要原因。

其一,《三国演义》中所记载的“蔡邕之死”对其形象带来的影响。蔡邕被杀,史书记载是源于叹卓之事,按《后汉书·蔡邕传》所载来看,蔡邕死后,当时之人皆为叹惋流涕,视其为一种“灭纪废典”难能长久的行为,连王允自己也有追悔之心。对此,李贤尚认为记载失实,力主以蔡邕之忠,必不会有叹卓之事。但由于《三国演义》以小说家的笔法,对该事件进行了加工和演绎,就变成了董卓被诛之后,蔡邕当街伏尸痛哭。叹息和伏尸痛哭,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样一来,蔡邕遂由一介无辜受害者的形象转化成了乱臣贼子的附庸,死有余辜。

其二,陆游有诗云:“死后是非谁管了,满街争说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在宋元戏曲中,蔡邕的形象从《三国演义》中的“政治失守”,逐步演化为《琵琶记》等戏曲中的“道德沦丧”,遂成为一个“不忠不孝”的历史符号。其三,自宋代以来,儒家正统思想进一步被强化,并用来评判人物行为、衡量作品价值,宋人以此为基点,对蔡邕的行为做出了严正的抨击;到了明季清初,顾炎武、王夫之等学者又对蔡邕进一步提出了“无识无守”的批判,而近代学

术大师钱钟书也谓其“才卑识芜”、文辞“淫媠”，无有是处。

毋庸置疑,这些学者的论断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但仅凭他们的学术地位,这些观点就足以垄断话语权,影响后人的判断,进一步深化了蔡邕的负面形象。文学史上历来以“张蔡曹王”并称,但从目前学界现状来看,对蔡邕的研究远远滞后于相并提的张衡、曹植、王粲等几位,他的文学地位和学术贡献,尚没有得到合适的评价和足够的认识。

第四,对学术权威的盲目迷信。当前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在于不加甄别地盲从于名家所做出的评论,对前人(尤其是学术名家)的结论不做分析地接受、袭用。在蔡邕研究中,大多数文学史教材都会引用鲁迅和钱钟书等人的评述,代替自己对文本的阅读和研究。其实,鲁迅和钱钟书的观点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做出的一般性评论,其观点是否正确,尚有待于深入研究了蔡邕文集及相关史料后才能做出较为公允的结论,但大多数学者都只是简单引用这些学术权威的结论。正如田晓菲在《尘几录——陶渊明及手抄本文化研究》^[10]一书中,从“手抄本”的角度对“真实的陶渊明”形象做出细致的剖析之后,认为我们所看到的“陶渊明”形象,是经由宋代人在自己的审美取向对各个版本进行选择、控制下得出的结果,这一视角和思路,为我们对其他中古诗人的研究树立了一个典范。

与陶渊明相似的是,蔡中郎的形象,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绎过程,而对他的抨击和责难,也主要来自于宋人。对蔡邕的评论很多,其中很多观点也需要加以甄别判断。摈弃前人有嫌偏激的论调,以细致的文本阅读为基础,结合详尽的背景史料分析,在此基础上,力图做出较为客观的论断,这正是本文所强调的在“当代视野下”进行蔡邕研究的意义所在。

三 当代视野下蔡邕研究的视角

蔡邕文集已经由南开大学的邓安生先生整理出版(《蔡邕集编年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这是一部文献学方面的杰作,也是首度对蔡邕集所作的校注整理工作,本文论述的文本则以邓本为主,参照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本、兰雪堂活字本《蔡中郎集》、杨以增校本、四部备要本、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等。

论文方面,当前以刘跃进对蔡邕的研究最为全面,他的《蔡邕行年考略》(《文史》2003年1期)、《〈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

第5期)、《蔡邕的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转变》(《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东观著作的学术活动及其文学影响研究》(《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蔡邕著述摭录》(《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4期)等论文从各个方面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多有见地,但囿于篇幅限制,这些单篇论文都只集中于某一个论题上。高长山的博士论文《蔡邕文学活动综论》(东北师范大学,2003年)从蔡邕的交游、文学活动等角度加以论述,但仍留有进一步深化的余地。蔡邕的《独断》一书,尚未见整理本出版问世。曾献飞的硕士论文《蔡邕〈独断〉校笺》(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所,2001年),在《四部丛刊》本张元济《校勘记》的基础上对《独断》进行了整理,但该书迄今未见出版。

总体来看,当前对蔡邕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某几个论题上,对于诸多问题的研究,学界还缺乏系统的、整体的关照,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探索。可以说,关于蔡邕的研究还有很多盲点,值得进一步深化、细化。

因此,力图在当代学术视野下正确客观评价蔡邕其人其文,深入探索蔡邕在对文学所起的作用,以便准确认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主要从三个角度加以考察:(1)结合历史时代背景,较为全面地考察作家及其作品;(2)在研究中,涉及到后世评论时,充分注意甄别这些观点,避免盲从;(3)注意研究对象本身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第一,结合历史时代背景,较为全面地考察作家及其作品。遵循“知人论世”的传统研究方法,通过考察蔡邕及其相关文学活动,深入探索他在东汉末年的文学地位以及他的贡献,以期准确认识蔡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先生认为:“倘要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这一观点,对当今的古典文学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蔡邕一生的黄金时期,正处于灵帝一朝。灵帝即位之初的建宁三年(170),他首次入仕,在朝九年时间,直至光和元年(178)金商门之祸后被流放;时隔十二年,直至中平六年(189)灵帝崩,他才第二次入仕,在朝四年,初平三年(192)因受董卓牵连而下狱而死。他享年60岁,一生仕宦的时间约前后13年,然而这却可谓是东汉历史上最为暗昧的时期。閹主权阉,争夺权柄,汉室王庭,危如累卵,先有宦官曹节、王甫等擅权,后有灵帝视为“父母”的赵忠、张让当道,军阀势力在外戚与宦官的剧烈斗争中、挟镇

压黄巾之势而登台,党人被诛杀、禁锢、流徙。对于蔡邕来说,他既以出身“世载孝友,重以明德”的阀阅之族相矜尚,又与党魁羊陟、郭林宗、度尚、胡母班等人相亲厚。以士大夫身份自视清流,绝不与宦官势力相苟合,这是蔡邕身上最为显著的政治标识和身份表征,而他一生的种种遭遇,青年时代的隐居不仕、撰文明志,壮年入朝后的斥言金商、流徙朔方,中年时亡命江海、遁迹吴地等,直至他最后从董卓之辟,复受牵连被下狱死,都因这一层缘故而起。故对蔡邕进行研究时,灵帝一朝的历史背景尤其需要加以重视:外戚、士大夫与宦官各个政治团体之间的激烈斗争,两次党锢事件,以及随着时局变动对党人时而高压时而略有松动的不同政令等,都是研究蔡邕时所需要密切关注的。

第二,全面考察蔡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一点也不应该被忽视,在“文学自觉”尚处于萌芽时期的东汉末年,蔡邕所撰写的碑诔等也应该被列入文学考察的范畴。事实上,蔡邕不仅工于碑诔的撰制,同时,他也是东汉著名的文学家,他所撰写的碑诔等作品,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第三,自魏晋起,后世对蔡邕的评论就从未间断过,各有贬褒,褒赞者视其为古文的正宗,赞叹他“搢牍六经,多识汉事”^[11],贬斥者谓其“无识无守”^[12]、“识卑辞芜”。对这样一位备受争议而又影响重大的历史人物,注意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作品等全面分析,充分注意后世评论的局限性,不为某一种观点所操纵、左右,也是在当代视野下开展学术研究的一种必要的客观态度。刘师培曾指出:“历代文章得失,后人评论每不及同时人评论之确切。良以汉魏六朝之文,五代后已多散佚,传于今者益加残缺。例如东汉文章,以蔡伯喈所传独多,而《艺文类聚》所引,宋人刻本《蔡中郎集》已未尽收。……故据唐宋人之言以评论汉魏,每不及六朝人所见为的……盖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也。”^[13]

这些观点,尤其值得研治中古文学史者重视。对于蔡邕这样一个名气和影响在当时都很大的人物,要做到客观而准确地评价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贡献及影响,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充分重视同时代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他的评价。后世文论家的观点不尽准确,这是在研究蔡邕的过程中必须要注意的一点,因为文论家一面要评价前人的作品,一面也不免受到他那个时代风气的影响,每一时代的文论家也只是以当时的标准、为自己时代作着取舍和评判,各取所需,并攻击、排斥不合己意者。

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应该明白前人的局限性。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全面考察蔡邕的文学创作成就及其历史地位,不仅要重视《文心雕龙》和《文选》这些巨著的观点,要参考后世文论家的看法,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钩辑蔡邕同时代人物的意见。把这些方面结合起来考察,力图使自己的结论和研究成果更具有客观性和完整性。

第四,汉末是一个孕育着新变的时代,士人的思想和行为都呈现出一种与此前不同的新变,作为“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日知录》卷一三“两汉风俗”),蔡邕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也是本文所重点关注的。朱晓海曾提出:“传统中国文学作品于勾勒人物时,最大的缺点之一莫过于立足黑白二分的潜意识,将人物刻板简化:孝子似乎父前母后始终都是色养无怨的,绮思狎念从未在烈女心头驻足,而被塑为权奸的任何利民举措都要以沽名钓誉来抹黑,暴君与慈父、多情种的性行表现不容并存,但事实上从未有过这种理型与非理型的人。就算是道,只要成了肉身,就不可能摆脱灰色地带的生活实际,在灵欲渊海中头出头没。”^[14]正如世人皆知的那样,人绝非一个抽象的概念名词,人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是我们必须得认识并认可的。

所以,研究蔡邕其人其文时,必须看到作者透过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他既是奉儒守道的典重文章高手,同时,美色爱欲、绮思狎念也未尝不曾让他时时萦怀。事实上,即使在蔡邕表明隐逸志向的《释海》一文中,仍然可以发现:抱璞优游、遁世避祸的主题下依然暗含着待机而动的用世思想,隐逸的向往与有为的期望同时被表达得真实而明确。可以这样认为,蔡邕的作品使他得以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平面的标本和单纯的符号呈现在读者面前,充分体现了人性复杂的一面,通过其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让我们对这位1800年前的历史人物有一个逐步接近本真并了解的机会。

四 结语

作为汉末学术大家,蔡邕生活的时代距离今天已经很久远了,历史变迁,坟典湮灭,兵燹火烬之余,即使以蔡邕最为擅长的方式记载在金石碑刻上,也很难让典籍穿越历史沉积的尘埃而呈现在今人的研究视野中。在收集资料和撰写的过程中,最大的感触就在于,由于史料的匮乏,一些思路和设想缺乏可信资料的支持,无法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索,也无法断然作出结论,这也是遗憾之一。然而,从现代学术研究的视野出发,广阔地结合那一时代的历史和政治

背景来考察其人其文,在无限的距离中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正是研究者所期望达到的目的,也能对中古文学研究有所补益。

[参考文献]

- [1] 陈海燕. 蔡邕研究[D]. 成都: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9.
- [2] [日]冈村繁. 从蔡邕看东汉末期的文学趋势[J]. 王琳, 牛月明, 译. 阴山学刊: 社会科学版, 1994(3): 18-25.
- [3] 刘麟生. 中国文学八论[M]. 北京: 中国书店出版社, 1985: 11.
- [4] 邓安生. 蔡邕集编年校注[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5] 龚克昌. 中国辞赋研究[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
- [6] 龚克昌. 汉赋研究[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0.
- [7] 钱钟书. 管锥编: 第3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017-1018.
- [8] 刘跃进. 蔡邕行年考略[J]. 文史, 2003(1).
- [9] 刘跃进. 蔡邕的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转变[J]. 文学评论, 2004(3): 138-146.
- [10] 田晓菲. 尘几录——陶渊明及手抄本文化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1] 高均儒. 蔡中郎集·跋[M]//蔡中郎集外纪卷末, 刻本. 清咸丰二年.
- [12] [清]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两汉风俗: 卷13[M]. 黄汝成, 集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13] 刘师培.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M]//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56.
- [14] 朱晓海. 汉赋史略新证[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416.

The Study on CaiYong in Terms of Contemporary Academic Vision and Its Value

CHEN Hai-yan

(Journal Center of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contemporary academic vision and through 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studies on CaiYong, the writer discovers the evaluation of CaiYong has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either extremely praise or vigorously denounce. Through analyzing the cause of the extremely contradictory phenomenon, we can find there are some serious malpractices on study for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Being short of reading the text in detail and for inadequate analysis of history data, the critics always take it for granted, taking the personality and morality as the criteria to judge the academic level, which is Vulgar history view. Thus people blindly worship the famous, which brings about false to false. Starting from analyzing these weaknesses, 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value to restudy the CaiYong again in line with the new academic vision.

Key words: later Han Dynasty; CaiYong; Contemporary Academic Vision; Zhongshu Qian; Luxun